



国防大学 2 071 0242 8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25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	屈 武(1)
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	刘仲容(24)
八十年来	黄炎培(49)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	叶沛婴(61)
我所了解的马寅初先生	严仁赓(66)
马寅初先生的硬骨头精神	吴觉农(71)
马寅初先生面斥孔祥熙纪实	潘 伦(74)
来函摘登	王云阶(78)
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	李 方(79)
蒋介石在溪口	张明镐(86)
我所认识的蒋经国	章异之(134)
蒋经国的母亲是怎样死的	汪坚心(148)
蒋介石的一次反共思想测验	庞镜塘(150)
回忆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案进行辩护 的斗争	李文杰(152)
“七君子”受审旁听记	陆 诒(160)
我所知道的章乃器	许汉三(166)

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

屈 武

在我国现代史上，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二次合作，发动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我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抗战胜利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诞生，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使我国免除一场历史大倒退的灾难，这又是我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我在这历史转折的年代里，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敬爱的周总理的教育、指导和挽救，使我能在革命的长征路上前进不息。如果说我在革命工作上，有什么点滴作为的话，这都是党和周总理教育、指导的结果。这里，把我在我国历史转折的年月里，和总理接触的一些事迹，记述下来，作为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哀思，同时也是我走在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惕励与鞭策！

一 抗战期间在重庆

我在苏联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喜讯，和卢沟桥的炮声激起了全民的抗战，使我对祖国的骨肉之情，日夜在激荡之中，我不能再安于国外了，于是在一九三八年，绕道西欧，由海路回国。到香港以后，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同志，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心情虽然有些沉重之感，但是在国共两党

团结合作情况下，对祖国抗战前途，是颇具信心的。我在香港稍事停留之后，即取道贵阳搭长途汽车到达重庆，当时正是中秋佳节。我的岳父——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亲自过江接我，我遂和他共住在康心之公馆的后花园里。

到重庆两天以后，于先生和我谈话时，很严肃地提醒我说：“你在国外多年，对国内情况不了解，我提醒你一件事：国民党内存在两个小组织，一个是军事方面领导的‘复兴社’，一个是由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团’。他们的名声很不好，各自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拉人参加他们的组织。你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上当。”后来果然这两个反动组织都曾拉拢过我，都被我拒绝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对他们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

到重庆以后，我接触各方面的人士，并仔细地体察祖国的形势和内部的问题。摆在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使我看清了政治上是非的分野，也逐步认识了祖国的出路问题。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抗战问题，抗战的胜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底，端视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我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应该感谢中共的同志们，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帮助。

我同周恩来同志的认识，是王炳南同志介绍的。认识之后，同他的接触就多了。有时候他通知王炳南找我谈话，有时候是我直接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主动找他谈话。我找周恩来同志主要是反映我所知道的重要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我和王炳南是经常见面的。他是我们陕西乾县人，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我们就认识。抗战期间在重庆，通过他的关系，我知道一些有关延安方面的动态，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言论，和前方与敌后的战斗形势。有一次夜间，王炳南找我说周恩来同志在新华书店楼上要我去谈话，我应邀前往，谈话时王炳南也在座。除了谈些有关时局问题之外，周恩来同志着重地对我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

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是多么珍视与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对国民党人是如何爱护并争取他们发挥积极作用。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在于先生身边生活了六年多的时间，一直是体念周恩来同志的苦心，本着他的指示帮助于先生做我所应该做的事情。

我和于先生生活在一起的初期，他对两党合作共同抗战问题，确有所怀疑。当然这是由于他不了解情况受反动宣传蒙蔽的缘故。有一次他问我：“据说我们的国军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他们不打鬼子，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因为什么？他们的企图是什么？”我说：“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我列举了各战区大量相反的材料，证明国民党军队奉上级命令，在前方和后方围剿八路军，并没收他们的枪械弹药。接着他就问我：“这些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情况是周恩来先生亲口对我讲的。”他听到我同周恩来同志有直接联系的话，很不安地提醒我说：“你要当心啊！重庆到处是特务。”他对我同周恩来同志的接触非常担心，但对我向他介绍的情况是相信不疑的。这时他已经察觉到的确有人在向他耳朵里灌输反共的谎言。

一九三八年冬，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找我，要我向于先生反映一件事情，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和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是汪伪组织成立以后，南京的汪伪政权派曾在上海活动多年的“CC”代表人物吴××到重庆进行日、汪、蒋的联系工作。周恩来同志获悉之后，立即要我转告于先生，请他力挽狂澜，挽救国家民族的危周。这些，我都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转告于先生了。于先生表示一定要注意，一

定要调查清楚，决不能听令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

一九四一年一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力量新四军，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袭击的皖南事件发生后，我把这一反共破坏抗战的阴谋策划和事变经过系统地告诉了于先生。他听了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他沉默了一会之后，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当时看到这位爱国老人的正义表现，深深同情他有心无力的处境。以后于先生听到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大街上卖《新华日报》的消息，曾以赞叹的口气对我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这些迹象都表明，于先生对国共两党合作坚持抗战，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已逐步地有所明确，态度也较严正了。

于先生一向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贪污腐化掠夺财物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他执掌监察院多年，本来想运用这一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祸国殃民的人，正是那些握有实权身居枢要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又哪里能发挥作用。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件，被弹劾的涉及到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先生坚持要执行监察职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决地为这些坏人进行庇护。于先生在气愤之下，表示要坚辞监察院长职务。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抗议，他带着李副官一人，离开重庆移居成都。他走后两天，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恩来同志说：“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接着他又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恩来同志还嘱托我代表他向于先生表示慰问，要我告诉于先生，他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于是我就驰往成都。于先生在成都住在陕西同乡严谷声家里，严谷声是个书香门第之家，房屋宽敞，于先生住在楼上，我住在于先生卧室隔壁一间房里。于先生在成都方面的老朋友和同乡们经常有人来看望他，也有从重庆专程来成都看望他的。但他情绪一直安定不

下来,这种情况持续有一月之久。记得在一个午夜后的四点钟左右,他突然起来敲我的墙壁,要我到他房里谈话。我到他房里坐在床沿上,他带着一点惊恐的神态告诉我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老蒋手持利刀,厉声对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我要你的老命,说着他就用刀向我胸部刺来,这样,我就惊醒了。”接着他又说:“这个梦是个不祥之兆呵!”我当即安慰他说:“做梦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这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接着说:“蒋介石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心狠手辣,有什么信义可讲。”我陪着他谈话,一直到天亮。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中稍有正义的人,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总是提心吊胆。

就在这天的早饭后,李副官上楼来向于先生报告说:“张群由重庆专程来看院长,现在在楼下客厅。”我陪同于先生下楼。张群见了于先生之后,照例先寒暄几句,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我是委员长派我代表他前来慰问院长的,并且要我迎接院长回重庆,委员长有很多重大问题要向你咨询。至于监察院的事你不管谁能去管呢!委员长很诚恳地盼望你回去。”蒋介石对监察院弹劾案的问题,他只字未提,显然是蒋介石并没有改变他原来的态度。张群到成都敦请于先生回重庆,不过是给他一个转圜的面子而已。这一点于先生是很清楚的,只是由于他夜晚的一场恶梦,心有余悸,也乐得顺水推舟,乘机而下。于是他对张群说:“只要委员长不再干涉我的监察院的职权,我就回重庆为党国效劳。”张群说:“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样,张群同于先生和我,一同回到了重庆。

关于于先生在成都时期的情况和他回重庆的经过,我曾向周恩来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当我说到于先生的“惊梦”的时候,恩来同志说:“看来,于先生脑子里还有些封建迷信的残余。老年人嘛,旧的影响是很难一时根除的。”我说:“于先生害怕老蒋害他,这种心理是有历史根源的。”恩来同志说:“于先生和邓演达先生不同,他这块元老招牌老蒋还是要利用的,绝不会加害于他。你要请于先生

鼓起勇气，对老蒋该顶的还是要顶。”

一九四四年春，一天，我忽然接到侍从室发来蒋介石召见的通知。见面后，他对我说：“今天我找你来，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已经决定派你到陕西去担任建设厅长。”我说：“我在重庆担任立法委员、陆大教官、军事顾问处处长、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等，工作很多，怎么能丢的下！况且在抗战时期，哪里有钱搞建设呢？为什么派我去做这项有名无实的事情？”蒋回答说：“这是祝绍周主席要你去的。你是陕西人，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好吗？至于建设需要钱的问题，这好办，我要财政部帮你解决就是了。”我说：“还是请委员长再考虑一下。”他见我不肯立即欣然受命，马上大发脾气，用手拍着桌子站起身来，声色俱厉地说：“这是命令！”说完扭身一转，我就辞了出来。

回到家中，我立即把蒋召见的经过告诉了于先生，并向他表示我不愿离开重庆的意思。他听了之后，沉思默想，始终一言未发。看样子老人的心情相当沉重，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所以我没有向他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但是我不甘心轻易地离开重庆，忽然想起蒋经国来，我想从他那里或者可能得到转圜的余地——他是我在苏联的同班同学，在苏联的长期生活中，有过患难相处的历史，彼此的交谊很深。回国以后，在原来友情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抗战期间在重庆、赣州、衡阳、昆明等地，后来在南京、上海、杭州、奉化，以及迪化（乌鲁木齐）等地，都有我们二人携手同游的踪迹——于是我就亲自去访他，希望他能向蒋介石关说一下，使我能继续留在重庆。出我意料的是在我见他之前，他早已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了。当我向他提出希望留在重庆的意见之后，他立即对我说：“老兄，不行啊！有人在委座面前告发了你，说你同共产党暗地勾结，并与苏联武官处进行非法联系；还说你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按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被简称为“小民革”），委座非常生气。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看在于院长的面上……他下面要讲什么，你自己会明白的。看来要你到陕西当建设厅长，已经是很宽大了。你想留在重

庆不去西安是不行的。我看你还是暂时到西安去。”我带着失望的心情，从蒋经国那里回来。

我之所以不愿离开重庆，原因就是我不愿意丢下那些对抗战有意义的工作，和不愿脱离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这个关系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在这期间，我直接间接接受了很多教益，也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一些工作锻炼机会。我及时地把蒋介石的召见和召见以后的经过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这样，我就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不得不离开重庆。

二 到新疆去

我自一九四四年春到陕西担任有名无实的建设厅长，为时一年有余。这期间，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设在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作些必要的秘密接触，反映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反共阴谋活动情报；此外，还和杜斌丞、杨明轩等同志做了些地下的革命活动，至于在建设厅的工作上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国人民八年的浴血抗战，赢得了最后胜利。九月初旬，我以到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为理由，回到重庆。在重庆仍住在于右任先生家里。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毛主席亲自到重庆主持谈判。在王炳南同志的安排下，毛主席在红岩村办事处，接见了我们“小民革”几位负责同志，共进晚餐，谈有七个多小时，我们都受到了很多教育，当时周恩来同志也陪同在座。

我这次在重庆住了两月之久，十一月初正打算返回陕西的时候，有一天，张治中先生来拜访于先生。他们谈话时，我也在场。张对于先生说：“蒋委员长准备派我到新疆去和平解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暴动问题。如果经过这次和平谈判能够把问题解决，实现

和平，委员长打算派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那就要经常住在新疆。现在正在商量组织一个和谈代表团的班子问题。”说到这里，张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愿意跟我一道到新疆去工作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一同去。”我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做主。”于先生把话头接过来，说：“他现在是陕西建设厅长，这是委员长亲自派去的，怕委员长不会同意他离开陕西到新疆去。”张说：“只要他愿意去，委员长那里的问题我有办法。他现在急于和平解决新疆的三区问题，因为三区问题与苏联有关，屈武参加代表团，有利于和平解决三区问题。”事后才明白，当时蒋介石急于要解决新疆三区问题，完全是为了要发动全面内战，必须安定大后方的缘故。

张治中走后，我立即去见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张治中要我到新疆去的问题。恩来同志指示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张治中的别号）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他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经过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心中豁然开朗，去从之间，有所遵循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张治中用电话告诉我说：“赴新疆代表团的名单，委员长已经批准了，他同意你到新疆去，最近就要出发，请你准备一下，起飞的日子定了以后，我再通知你。”这样，我的去处就定下来了。出发以前，我又去见周恩来同志，告诉他蒋已批准我到新疆去。恩来同志很高兴，说：“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一百多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他到新疆后，请他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淡忘下来，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这样，到新疆去，早日释放这批被押很久的同志，就成为我肩负任务的当务之急了。

赴新“中央和平代表团”，是遴选各方面有关人员约十人左右组成的。其中有属于孙科派系的梁寒操、代表黄埔军人的邓文仪、“CC”骨干分子彭昭贤和回族代表后来担任新疆民政厅长的王曾善等人。代表团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飞往新疆。飞抵迪化市后，即以阿哈买提江为团长、赛福鼎为副团长的三区代表团进行谈判。这一和谈经过极其复杂的过程，为时达半年之久。中间我曾随同张治中一度飞返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三区地方代表团所提出的条件，和谈判的过程，并请蒋指示。经过反复磋商，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夏天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哈买提江为副主席的“新疆民族联合政府”。在新政府举行成立大典的时候，于右任老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飞到迪化进行监督。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同志所预料，我们到了新疆之后，张治中对释放在押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的事，并未重视，却以全部精力灌注在三区的和谈问题上。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身负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务，无时无刻不萦绕心头，使我耿耿不安。最后，终于在我一再地提醒和催促下，张治中才决定要我一面参加和谈，随时同苏联驻新总领事联系，一面要帮助他处理释放这批中共党员的工作。首先，我代表张到监狱里，去探望并慰问杨之华（杜宇）和她的女儿独伊。杨之华是瞿秋白同志的爱人，她是一位英勇战斗坚贞不屈的好同志。我和她们母女分别作了两次谈话，我为了安定她们的情绪，有意识地透露了我和周恩来同志的关系，并告诉她们恩来同志对她们关怀，和恩来同志与张治中商定释放她们以及张同意由我协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情况。杨之华母女告诉我她们入狱以后在监牢里同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进行斗争的经过。从她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批被关押的人，都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我向她们表示了慰问和敬佩之意。

我同时视察了关押中共党员的监狱情况，发现环境和生活待遇都十分恶劣，我向张治中作了汇报，他马上下命令改善监狱的待遇，提高狱中入的伙食标准，并按他们的要求，把男女监并在一起。

在我的安排和参加下，张治中曾邀请被押党员同志的代表举行会谈。张治中为了释放这批同志，先后曾三次电请蒋介石予以批准，中间虽然经过很多波折，但是蒋在内外形势的迫使下，不得不同意释放。决定开释遣返陕北之后，张治中曾举行欢送宴会，我也参加了，气氛是很和谐的。张治中指派专人护送这批同志回到陕北，首途之日，我并代表张治中为他们送行。这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夏之交新疆联合政府正式成立以前的事情。

这批党员同志安全到达延安之后，受到党中央的热烈欢迎。后来他们都被派到各方面担任重要职务，其中不少的人承担了一个方面的领导工作。三年之后，即一九四九年我参加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周恩来同志第一次找我单独谈话时，首先就以非常满意的口气表扬了我在新疆协助张治中释放这批中共党员的功绩。我自己也认为我认真地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胜利地完成了一件党所要办的任务。

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我任省府委员兼新疆首府迪化市市长。至于我在新政权里留任乌鲁木齐（迪化）市长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那是一九四九年秋新疆和平解放以后的事。

三 参加国共北平和谈和新疆起义

一九四八年冬，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延续三年之久的空前规模的内战，胜败之局已定。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元旦通电求和。他经过一番周密的军事布置之后，于一月二十一日晋谒了中山陵，当日下午乘飞机黯然离开南京避居奉化，以下野之名，行其暗中操纵之实。蒋走后，副总统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立法、监察两院，也是一片和谈的喧嚣。于是李宗仁不得不在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时我仍任新疆联合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乌鲁木齐)市长。张治中任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行辕主任。关于国共两党的和谈问题,酝酿折冲,煞费周章。李宗仁属意于张治中出来担负这一艰巨任务,而张当时虽然身在南京,却不愿负这项责任,因此,他在一月底就飞返兰州了。后来李宗仁对张函电交促,敦请他返回南京共商和谈大计。张在二月二十日邀我由迪化飞兰州,然后一同飞返南京。为了摸清蒋介石对和平谈判的底细,三月三日张同吴忠信和我分途到奉化。在奉化张和蒋介石作了多次长谈,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共八项和谈前提条件的研究,和劝蒋暂时出国问题。对前一个问题,蒋在许多方面意见是不很明朗的;对后一个问题,他非常反感。张当然不好坚持要他出国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在那里共住了八天就一同返回南京了。在南京经过多日的酝酿磋商,直到三月二十四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才正式组成。和谈代表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和刘斐。张治中推荐卢郁文担任秘书长,推荐我担任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决定四月一日飞往北平。三月二十八日张治中对我说:“我们在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请你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这件事情我已经同李德公(李宗仁号德邻)说好了,他同意我们到奉化去。”于是在三月二十九日,我同张二次飞往溪口。在飞机里张治中对我说:“你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你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到奉化以后,我同蒋委员长谈,你就同蒋经国去谈,他对他的老子还是有影响有作用的。我们在奉化只能留住一天,明天必须飞回南京,因此,我们都要抓紧时间。”

张治中在奉化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和蒋介石作了几次的晤谈,有时是他俩单独谈,有时是有吴忠信在座。在一次谈话中,蒋表示对政治有厌倦情绪,希望实现和平,他愿意终老故乡。张治中认为蒋这句话是具有诚意谋求和平的,他回到南京立即作为新闻发表,并应邀在立法院对全体委员作了一次公开讲话。当他谈到蒋介石

“甘愿隐退”时，曾博得全场热烈的鼓掌欢呼。可见当时南京政府的内部，对蒋完全丧失了信任。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的秘书处工作人员于三月三十一日先行飞平。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秘书共十九人于四月一日下午由南京经青岛飞抵北平。张治中以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团长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去接他，不料到机场欢迎的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和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张治中垂头丧气，情绪低沉。代表团进城后被安排在六国饭店，进了饭店之门，就看见挂着一幅大标语写着：“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这对张来说，又是当头一棒。张悄悄地对我说：“看起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所怀疑的。”进了房间，张长时间地闷闷不乐，显然，思想上有所负担。

过了一会，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来到饭店拜访。恩来同志以很和蔼热情的态度，握着张治中的手表示欢迎之意。接着他以很严峻的态度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你在事前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这一问使张非常尴尬。此时张才知道北来之前的奉化之行的秘密，中共早已知道了。他连忙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呵！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张的话也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周恩来同志接着说：“那好！将来看事实吧。”这以后，大家就轻松愉快地漫谈一阵，这是双方第一次的接触情况。

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于四月十五日，对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这是双方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代表团在会上正式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即南京方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必须在四月二十日以前表明态度。

就在双方代表团达成和平协议这天，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十六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

共进行谈判。”张治中立即召集团中成员，讨论这个电报。他首先表示意见，认为于先生此时没有必要北来，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大家同意张的意见，于是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会上并推定黄绍竑和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飞南京复命并请示。

十六日的早晨四点钟，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我汇报了国民党代表团对于于先生北来问题的决定。恩来同志说：“我都完全知道了。白天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张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过事干涉。”接着恩来同志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二十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后来周恩来同志又问到关于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我们作了一些分析。恩来同志说：“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这次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十六日上午十时，我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飞回南京。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夏威、李品仙等军政要人都到机场迎接。到南京后我和黄由机场乘车直往傅厚岗李宗仁公馆。下午在李公馆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和黄绍竑外，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共六人。先由黄绍竑简要地报告和谈经过，即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李、白等人传阅。大家看了文件，面面相觑，无人发言，情绪极为低沉。后来

还是白崇禧打破了沉寂，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何应钦接着说：“问题重大，行政院要进行研究。”李宗仁和黄旭初一言未发，大家垂头丧气地散了。出门以后黄绍竑对我说：“看来情况不妙呵！”我说：“我至于右任家去住，有什么消息，请用电话告诉我。”说着我们二人就分开了。

我见着于先生，便把在北平和谈经过和李宗仁公馆会议情况告诉了他，最后我说：“看起来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于先生说：“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到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再打起来我就留那里不回来了。”我说：“这正是周恩来先生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于是我将周恩来同志希望于先生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转述一番，并补充一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补救办法。”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过了两天，黄绍竑来电话告诉我，说行政院开了秘密会议，李宗仁参加了这个会，会议把《国内和平协定》否决了，白崇禧已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已准备打仗。黄又告诉我，说他已向北平方面通了电话。接完电话，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于先生，并劝他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思不要离开南京。于先生说：“你先把孩子们（我的儿子和儿媳）送上飞机去上海，你留在我身边，看形势再决定去留动向。”我当天就按照于先生的意思把孩子们送到机场，恰巧遇见黄绍竑。他对我说：“大局已不可挽回，我现在搭机飞往香港，你怎么办？”我说：“我不去香港，另有去处。”寥寥数语，我们就匆匆分别了。

四月二十一日晨，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晋见于先生，他穿着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并带着一个武装卫士，态度很严肃地对于先生说：“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先生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个人以威胁的态度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气势凌人，大有绑架之势。

没有等于先生穿好衣服，就强迫于先生上车驰往机场。于先生要求先到上海。这样我们就飞抵上海，住在于先生家里。我问于先生：“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他说：“我们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都已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会遭遇被强迫架走的命运。”接着于先生反来劝我说：“你也最好先留在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我说：“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我没有向他说明我回新疆去的意图。恰好这个时候国民党甘肃军区司令郭寄嶠奉命回甘肃布防，向于先生辞行，我就乘机告别于先生，搭乘郭的专机飞抵兰州，然后搭乘便机回到新疆迪化。于先生经香港去北平的愿望终未实现。据说国民党残余最后由四川撤退时，于先生曾要求去香港治病，表面上同意了，但结果被哄骗用飞机运到台湾去了。

我之所以急于回新疆，就是为了执行周恩来同志在北平交代我的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为了对党、对周恩来同志、对人民负责，我必须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

新疆起义，这是当时大势所趋，势所必至的事情，但是这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经过了半年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在紧要关头，我几乎断送了性命，幸亏陶峙岳的大力援救，始得免遭反动将军们的毒手。新疆起义终于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九月下旬实现了。新疆宣布起义之后，陶峙岳将军要我担任“欢迎解放军新代表团”团长。于是我就率领这一代表团驰赴甘肃酒泉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受到了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热情接待。在我们代表团所乘的插着欢迎旗帜的吉普车前导下，人民解放军不费一弹，没流一滴血，浩浩荡荡地进驻了祖国的大西北。到达新疆省会迪化的时候，全城欢腾，热烈欢迎人民军队的到来。广袤的大西北边区，从此宣告和平解放，回到祖国怀抱。我庆幸地能够投入一点力量而“不辱使命”，心情是多么高兴！